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70)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

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黃克武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70)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 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黃克武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70)

一個被放棄的選擇： 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著 者／黃克武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115 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02)27822916・27824166

劃撥帳號／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 購 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排版印刷／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02)82278766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

再 版／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

定 價／平裝本新台幣 3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精裝)ISBN 957-671-201-7 (平裝)ISBN 957-671-202-5

墨子刻先生序

1982 的秋天，黃克武先生第一次上我在台灣師範大學所開的課，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常常有密切的溝通與合作，而他一再地發表了多篇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尤其是他的〈理學與經世：清初《切問齋文鈔》學術立場之分析〉（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6，1987）、師大的碩士論文〈《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1985）、〈鏡花緣之幽默——清中葉中國幽默文學之分析〉（載《漢學研究》，卷 9 期 1，1991）、〈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1991），和〈從申報醫藥廣告看民初上海的醫療文化與社會生活〉（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 下，1988），而最近他又出版這本專刊《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

有時看到黃先生這些傑出的作品，我常幻想而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不錯的老師。其實學生有兩種，一種沒辦法教，一種不需要教，而黃先生是偏到第二類。所以無論誰是他的老師，他都會找到自己的路。然而，我不否認因為黃先生與我興趣投合，而在學術研究上有相當程度的交流與會通。我認為研究歷史至少有三個不能相互化約的角度，即是注意到事件 (episode, 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重要人物的傳記 (biography)，與制度或思想上的架構或模式 (pattern, 像宋明理學的構造或梁啟超思想的脈絡)。最理想的歷史家，會同時強調這三個

方面，但是多數的學者往往會偏到其中之一，而黃先生與我一樣，特別喜歡研究上述中的第三項：歷史的模式。

然而如何研究思想模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研究某種思想時，我們當然要知道它有沒有「價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像唐君毅教授所撰《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那樣的書，即是一種評估性的研究或哲學性的分析。這類的書雖然也描寫思想的一些特點，但它最重要的目標，是以一種對真理或人生價值的認識，去評估該種思想，看它是否能發揮真理，或對真理有所誤解。

這種評估性的研究當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即使是一些沒有價值的思想，歷史學家也應該很詳細地加以描寫，而不應忽略。為什麼？

第一，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一樣，希望了解所有人類生活之中重要的面向，並把握所有人類生活的構造，而在我們從事思想研究之時，如果某一觀念或某一詞彙常常出現，並在該思想邏輯上有其意義，那麼它就算是重要的。例如，宋明理學常常談到「陰陽」，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說法幾乎沒有價值，而在研究歷史時，歷史學家不能抹煞這些說法，而專從「為己之學」的角度，來了解宋明理學。

第二，要決定某一觀念有沒有價值，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很多學者覺得「理性」與「道德」是很明顯的東西，而用它們來評估歷史性的觀念，也是輕而易舉的，然而「理不易明」，這樣的工作，其實並不容易。比方說，黃先生在這本書中描寫到二十世紀初兩種很不相同的對中國現代化的看法，即是譚嗣同的轉化性的看法，與梁啟超的調適性的觀點。哪一種思想比較合理？要討論這個問題需要很多的研究與反省，才能慢慢地找尋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觀點，在此過程中，人們並無法依賴一些很明顯的標準，來從事評估的工作。換言之，我們

處於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複雜時代，因此需要將「評估標準」的問題挖掘出來，並以最系統的方法，來尋求解答。然而，這種工作必須以一個更根本的功夫為基礎，亦即是將描寫與評估的兩個方面，盡可能地分開來。這樣一來，我們一方面能細緻地描寫歷史人物的思想特徵，另一方面，也能慎重地考慮這些思想特徵，到底具有何種價值。

黃先生的這本書並沒有完全避免評估的問題，但是他的貢獻主要是在描寫方面。梁啟超的思想博大精深、複雜多變，而在近代中國有很大的影響力。難怪在中西學術界，每一個年代的學者都對梁啟超的思想，有他們自己的看法。黃先生現在仍然繼續研究梁啟超的思想，他以後將會提出更進一步的完整解釋，然而，我相信他這本書的結論完全可以立足。我不否認我覺得黃先生這個研究十分重要，我也相信我們愈了解梁氏調適思想的特徵，我們就愈可以了解到此一思想所具有的价值。

我個人認為近代中國的「啓蒙」，與其說是許多人豔稱的五四運動，還不如說是梁氏的調適思想。梁啟超和不少西洋學者一樣，以為現代化不單純是培養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過程，而是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奮鬥，即是把神聖的價值與物質的進步，結合在一起。而且他和牟宗三教授一樣，了解到此一揉合的過程，是一條充滿困難而崎嶇複雜的「曲通」之路，人們不能在一瞬間直接地跳入一個「大公無私」理想境界。現在很多的歷史學家以為，在歷史的因果關係中，思想的因素並不重要，我不以為然。其實無論是西洋文化也好，中國文化也好，二十世紀人類悲劇的淵源，常常和知識分子在思想上的取捨，有密切的關係。

自序

梁啟超是一位複雜多變的思想家，自民初以來，中、外文之中有關梁氏思想的研究可謂不勝枚舉，本文是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企圖以《新民說》為基本史料，分析梁啟超在清末的思想變遷與意義。《新民說》在問世之後就深受讀者歡迎，可以說是中國新知識分子必讀的一篇作品，因此該文的內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新民說》所討論的主要課題，和梁氏對這些課題所提出的回答，都是對中國近代思想史有興趣的人，所不能忽略的。

這本專書的出版對作者來說一方面是一個結束，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個新的開始。就前者而言，它代表過去多年來對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學習與摸索的一點點心得，希望提出來與師友們共享。但就整體的研究計劃來說，這只是一個初步的成果，本研究所希望探索的根本問題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國思想界的整體狀況，或說當時思想的光譜 (intellectual spectrum)，而梁氏的思想只是其中一端而已。接下來還有許多的工作要做，例如嚴復的思想內涵及其在此光譜上的角色、《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甚至此一思想光譜與十九世紀初葉以來傳統經世思想的關係等，都有待澄清。

這一本專刊的前身是作者於 1992 與 1993 年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與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 與康無為 (Harold Kahn) 兩位教授所寫的兩篇學期報告，原是以英文寫成，只具論文的形式與規模，

後來以中文改寫，逐步修改、增添，而變成這一個有十餘萬字的專刊稿。在此要特別感謝兩位老師這幾年的細心教導，以及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姜進、秦玲子等同學的砥勵，沒有史丹福大學所提供的學術環境，這本專刊是寫不出來的。文成之後又經張朋園先生與張灝先生及一位不知名的審查者看過，提出一些批評與繆讚。兩位張先生是當今研究梁啟超思想的祭酒，能撥冗校閱是我最大的榮幸。

張灝先生對作者所提出梁氏思想的三個特點，有不同的意見，他肯定梁氏思想與傳統的密切關係，對梁氏的幽暗意識有所保留，對筆者所說的梁氏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以及卷首所引蕭公權先生的話，則不表贊同。張灝先生認為梁氏受傳統影響，他對群己的看法採取「人格主義」(personalism)，強調個人的尊嚴，但沒由個人至上的觀念，尤其在清末之時，中國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所以張灝先生認為梁氏所重視的仍是群體，他有很強的個人要為群體犧牲的觀念。這些地方有待讀者的判斷。

這一本專刊的出版最應感謝的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與墨先生的一段因緣，是我的學術生涯中最幸運的一件事。1982-3年墨先生於台灣師大課座，我上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與「明清制度史」的課，1984-5年他與李國祁先生又指導我以鴉片戰爭前夕魏源所編《皇朝經世文編》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他對學問的執著、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對台灣經驗的肯定，以及對海峽兩岸未來走向的關懷，不但使人景仰，也令人感動。我這些年來所寫的東西都與他反覆討論，這一本書也不例外。我在完成中文的初稿之後，來來回回請墨先生為我改了不下十餘次，他積密的思考與嚴厲的批判，使我漸漸養成不敢亂下妄語的習慣。他常說這一種治史的態度，是學自他的老師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當然墨先生治中國

思想史有他自己的心得，他不但一字一句地研讀中國古典文獻，更以一套自創的分析架構，來重建思想家思考的過程 (thinking)。這一本專刊如果有一些貢獻的話，和這套新的方法論有很密切的關係。我願意將這本書獻給墨子刻先生。

在本書出版的過程中承蒙魏秀梅女士、許淑玲女士以及本所同仁的多方協助，謹致謝忱。最後要感謝父母和家人對我的照顧與支持。

黃克武 序於南港

1993.7.24

再版說明

本書於 1994 年 2 月出版之後，轉眼之間已超過十年，該書早已售罄，然因諸事繁忙，無暇修改。最近才完成再版修訂的工作。此次的修訂，除了改正錯字、潤飾文字之外，筆者也增加了一部分內容，補充說明學界中新的研究成果，但全文的結構、觀點仍維持原貌，敬請方家指正。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承蒙本所同仁魏秀梅、張力、張珍琳、王美雪等人多方協助，謹致謝忱。

黃克武 2005.11.21

任公的民權思想與《民報》所揭櫫的民權主義有不盡相同之處。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較接近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他反對「民之父母」的政治觀。民權的目的是經過「開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個人得到最高的人格發展。一個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無微不至，縱然使得人人豐衣足食，但因為他阻礙了個人自動自發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論者也講民權，但他們的思想淵源，與其說是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 S. Mill），無寧說是法國革命先覺的盧梭（J. J. Rousseau）。他們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權力以發展個人能力為目的，而以檢束個人自由以伸張國家自由為宗旨……如果上述的觀察尚無大誤，那麼任公之與革命運動終歸分離似乎還有思想上的因素。

蕭公權，張朋園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序

目 錄

墨子刻先生序	v
自序	ix
再版說明	xiii
蕭公權語	xv
第一章 導論	1
第二章 《新民說》的創作背景與影響	41
第三章 目標：自我與群體的關係	63
第四章 梁啓超對知識的看法	91
第五章 梁啓超對世界歷史與中國現況的觀察	105
1. 地理、宇宙與人性	106
2. 社會的組成結構與歷史發展的基本原則	113
3. 西方與日本的歷史發展	120
4. 中國傳統	124
5. 中國當前的困境與希望的淵源	132
第六章 梁啓超對實現目標之方法的看法	141
第七章 譚嗣同的《仁學》及其與梁啓超調適 思想之異同	157
第八章 結論	175

徵引書目	195
一、《新民說》各文的出版資料	195
二、中日文部分	197
三、英文部分	205
索引	213

第一章

導 論

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思索的一個根本課題，是如何修改自身的文化傳統，以促進國家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他們努力追求的首先是使中國達到物質生活的富裕，與軍事上的成功，清季自強運動（亦稱洋務運動）的展開，與此「追求富強」的意念有直接的關係。但隨著自強事業的艱辛，與中日甲午之戰的挫敗，知識分子逐漸地了解到，西方的富強實際上是奠基於一套「屈私以為公」的民主制度之上，因此對於「民主」的討論又成為人們思考的焦點。^①當時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如嚴復（1854-1921）、康有為（1858-1927）、譚嗣同（1865-1898）、孫中山（1866-1925）、章炳麟（1868-1936）、梁啟超（1873-1929）等人，幾乎都環繞著「富強」與「民主」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現代化的問題。^②

然而辛亥革命前後知識分子對現代化與文化修改的辯論，卻形成了一個複雜的思想的光譜（spectrum），其中有兩個較重要的不同傾

① 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

② 有關近代中國民主觀念的討論，見拙著，〈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363-398。

向，在光譜的一端，比較強調漸進革新，而光譜的另一端，則比較強調激烈變革。清末民初之時，這兩者分別以「改革派」（或稱立憲派）與「革命派」為代表，在此之後也有其他方面的表現。清末民初改革、革命兩派的分歧，一方面固然是在於權力衝突與私人恩怨，另一方面也涉及兩者對於一些根本問題的不同主張。^③ 根據汧冰峰與朱浚源等人對清末（主要是 1905-1908 年間）改革派《新民叢報》與革命派《民報》之論戰的研究，這些主張可分為民族、政治與社會民生等三方面來說明：在民族方面，革命派主張排滿，以為推翻滿清是政治改革的前提；改革派則以為滿漢一家，認為沒有種族革命也可以進行政治改革，因為關鍵不在滿人，而在全體國民的程度。在政治方面，革命派以為實行革命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途徑，故主張以武力推翻專制，建立共和政府；改革派則以為革命不但伴隨著殺人流血之慘劇、下層社會暴動，而且給予外國干涉之口實，會導致瓜分與亡國，故他們倡導漸進改革，主張先採行開明專制，再逐漸進步到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在社會民生方面，革命派追求土地國有與平均地權，其著眼點是無私與平等的原則，是傾向社會主義的；改革派則並不反對社會主義的終極理想，但不同意立即實行社會革命，他們以為中國之患在貧，不在不均，社會革命陳義過高，立即推行僅會帶來動亂，故他們傾向採取

③ 經濟學家海耶克 (F. A. Hayek) 曾引用休謨 (David Hume) 的觀念，注意到「利益」(interest) 與「意見」(opinion) 兩者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傾向思想觀念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說「雖然人們常常受到利益所控制，但是即使是利益本身，和所有的人類事務，是完全被意見所控制」(底線乃原文所有)。Thomas A. Metzger, "Capitalism as Progress: A Critique of F. A. Hayek's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p. 580.

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來提高生產。^④

上述兩派的區別亦涉及雙方思想淵源與類型的差異，蕭公權（1897-1981）在張朋園所著《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的序中，有一段既敏銳又重要的話：「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較接近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民權的目的是經過『開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個人得到最高的人格發展……革命論者……的思想淵源，與其說是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 S. Mill [本文譯為彌爾]），無寧說是法國革命先覺的盧梭（J. J. Rousseau [本文譯為盧騷]）。他們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權力以發展個人能力為目的，而以檢束個人自由以伸張國家自由為宗旨」，^⑤其中已點明立憲派的擁護者，如梁啟超強調限制政府權力，與發展個人人格，革命派的支持者，則力主伸張國家自由，而檢束個人自由。李澤厚也指出「改良派」（包括康有為、梁啟超與嚴復等人）主張「英國派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革命派則信奉「強調平等的法國派民主主義政治思想」。^⑥至於朱浚源則以為，革命派的民主思想特別

④ 有關此次論戰的討論，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頁 207-232；亓冰峰，《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2006]）與朱浚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1995]）。日文方面有寺廣映雄，〈革命瓜分論の形成をめぐる——保皇・革命の對立〉，收入《中國革命の史的展開》（東京：汲古書院，1979），頁 43-71，以及有田和夫，〈改良派と革命派——變革意識のかたち〉，收入《清末意識構造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頁 167-193。英文方面有 Michael Gasste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irth of Modern Radicalis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68-84. 以及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29-197.

⑤ 蕭公權，〈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序〉，該書頁 2-3。

⑥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281。

受到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的三權分立，與盧騷「總意」(general will) 觀念的影響，改革派則批評「總意」無法實現。^⑦ 以上思想的分野實際上是植根於兩個精神迥異的西方民主傳統，這一區別對當代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學者來說，似乎並無爭議性，一是以盧騷 (1712-1778)、黑格爾 (Hegel, 1770-1831)、馬克斯 (Karl Marx, 1818-1883) 為典型的民主傳統，一是以約翰彌爾的《論自由》(*On Liberty*) 一書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傳統 (liberal democracy, 以下亦稱彌爾主義, Millsianism)。前者主張建立一個可以徹底表達人民意志，並消除所有階級間之剝削的政治體制，具有強烈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精神，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中所表達的正是此一理想。^⑧ 後者的代表人物除了彌爾之外，還有在他之前的洛克和美國的聯邦主義者 (如 Alexander Hamilton、James Madison 與 John Jay，其主張見 *The Federalist*)，與在他之後的韋伯 (Max Weber, 1864-1920)、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和二十世紀美國主流的政治思想家，他們的理論則以承認階級劃分之社會為起點，力圖以一套民主的架構來保障個人不受政府壓迫，並進一步提供人們自我發展的機會。^⑨ 由此可見，上述兩個近代中國民主思想的取向，在西方有其淵源。

⑦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頁 117。

⑧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 Inc., 1978), pp. 469-500.

⑨ 有關西方的兩個民主傳統見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pp. 72-139. 中文方面的簡要介紹，見黃克武，〈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意義與淵源〉，頁 367-372；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9-33。